

红军长征是一场悲壮而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谱写了一段令人引以为豪的英雄史诗。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其中,经济上的艰难成为红军长征中的一项重大难题,从今天依然保存的长征时期的钱币中,我们可以一窥当年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中军民的生活状况。

长征时红军用什么样的纸币

两张长征时期使用的纸币

在天津钱币学会会员、天津市文博学会民间收藏专业委员会委员张宗彩的藏品中,有两张红军长征时期使用的纸币,一张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于1933年发行的“伍角”纸币,另一张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赣省分行于1934年发行的“十枚”纸币。虽已过去80余年岁月,两张纸币上已浸染出淡黄色的包浆,但它们票面完整,图案、文字清晰可辨。

这两张纸币上显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于1932年的瑞金。据史料记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会的银行管理机构,资本由国库预算中拨给,第一任行长为毛泽民,其业务包括分行、支行、兑换处等,办理抵押、贷款、存款、票据买卖贴现、汇兑、发行钞票、代理国家金库,另外还发行革命公债及经济建设公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纸币票面上最大的特点是五星、镰刀斧头的图案,有的票面上还印有列宁像,象征着工农革命,具有深刻的时代和历史烙印。

在经济拮据的根据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启动资金有限,给印刷钞票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史料记载,当时找不到印刷钞票的道林纸,就用麻片、毛竹、树皮等为原料进行土法造纸。和所有钞票一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也需要防伪,张宗彩介绍:“从两张纸币来看,其防伪主要是纸币上的签名以及印章,虽然现在看来,这种防伪手段显得格外简陋,但是在上世纪30年代,还是能够有效地起到防伪作用的。”

纸币上签名的有趣故事

说到这套纸币上的签名,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在这套纸币刚一出现



长征时期红军使用的纸币

的时候,进攻苏区的国民党反动派就计划用伪币搅乱苏区的金融体系,可是,当他们开始仿造苏区纸币时,却发现最难仿造的就是纸币上的这两个签字。一直以来,许多人都想弄清楚这两个签字到底是怎么回事,却都没有结果,直到上世纪90年代,这套纸币的设计者才为大家揭开了这个隐藏半个多世纪的签字之谜——那是时任行长毛泽民的俄文签名。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这些纸币为红军长征之前印制,据张宗彩了解,由于红军长征时部队处于行进状态,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跟随部队转移,很难停下来发行纸币,因此在红军长征至陕北的过程中,之前印制的纸币依旧流通。另外,在长征路上,遇到国统区无法使用这些钞票时,红军便用银元或给百姓打欠条购买军需物资。时至今日,每当面对这些革命根据地的纸币时,一幕幕悲壮的共产党人革命史仿佛在眼前浮现。

在张宗彩的藏品中,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解放区纸币成为其收藏的一大特色,他的藏品涉及新中国成立前的所有革命根据地、解放区。值得一提的是,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他拥有山东解放区发行的北海银行纸币200余种,接近于收藏齐全,使其在圈中小有名气。

印刷水平看出共产党人的艰苦

为了收藏北海银行的纸币,很多年来,张宗彩经常去山东各地寻访。回首多年的收藏之路,他觉得如今取得的收藏成绩和过去多年的坚持密不可分。

张宗彩的收藏之路不都是历尽艰辛之后淘到宝贝的喜悦,很多时候,还有焦虑的等待和期盼。他回忆,有时候费尽力气来到一个偏僻的村庄,多方打听,却发现这里根本没有他需要的纸币,失望之余只好原路返回。还有一个夏天,他到一个当地的朋友家寻访纸币,但是朋友不在家,当时还没有手机,没法联系,他只得在那里住了四天四夜。“天气很热,蚊子又多,我只好挂个蚊帐睡觉。实在热得难受,就在蚊帐里放个电风扇一夜一夜地吹。那些年吃过的苦说也说不完,不过最后找到了想要的纸币,心里真是高兴。”他说。

东北银行、晋察冀边区银行、长城银行……张宗彩为记者展示的当年的纸币品种多样,票面规格各异,印刷水平也参差不齐。对此,他解释说,当年很多纸币是在敌人对革命根据地实行严密封锁以及自身经济艰难的环境下印刷出来的,因此与现代钞票的质量无法同日而语,“一批钞票和另一批钞票的用纸都不一样,另外墨的颜色也各有不同,可见,当时能购买到什么样的纸和墨,就用什么样的纸和墨印制了钞票,这也反映出当时共产党人艰苦的经济环境。”他说。

摘自《城市快报》



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

摘自《解放日报》

环球扫描

大航海时代,有钱人叫“胡椒袋”

香料和黄金是大航海时代西方人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的终极目标,但古典绘画中鲜见香料贸易的描绘,佛兰德画家安东尼·凡·代克的这幅《香料商人》,可谓凤毛麟角。

香料商人是当时大收藏家和大画家的赞助人。这一切皆来自香料神奇的身价。考古人员从公元前1224年下葬的埃及法老拉美西斯的鼻孔里发现

了几颗胡椒,这表明埃及人很早就沉迷于香料,它是一种高尚生活的标志。从现代营养学来讲,香料并不是营养的一部分。其科学定义是“香味是蛋白质分子,触碰嗅觉神经使之分泌传导物质引发身体的连串化学反应”,这句绕舌话把香味本体定义为“蛋白质分子”,仅此而已。不过,古代西方人不这么认为,古罗马曾有一个叫埃及



木板油画《香料商人》

希乌斯的美食家,他在公元1世纪写了一本《烹调指南》,书中开出的460个食谱中,仅胡椒一项就出现了350次。除调味与防腐功能外,西方人还认为,

香料还有去湿壮阳、催情助爱之功,因而将它写入《爱之膳》食谱中。

当然,香料的魔力还在于它是稀缺之物,奥斯曼攻克君士坦丁堡,不仅挡住了西人东进的脚步,也控制了香料贸易。最初,西方人只能听任土耳其人漫天要价,价格翻十倍百倍,极为正常;后来,他们不远万里开发了东印度航线,但路途遥远,运回西方的香料,也价比黄金,以致说某人富有时,就说他是个“胡椒袋”。

摘自《深圳晚报》

史海钩沉



1928年,北平市政府出台《交通守则》:“若须在北平市内驾驶汽车,须持有驾驶执照,无执照者罚银十元,已领执照而驾车时不携带者罚银四元。”

现在的驾照是要经过考试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领驾照需不需要考试呢?同样需要。只是民国时代四分五裂,政令不一,自始至终没有搞过统一的驾照考试。

以上海为例,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这座城市有三个部门可以颁发驾照:一、公共租界工部局;二、法租界工部局;三、上海市政府公安局。想拿英美驾照,去公共租界工部局考试;想拿法国驾照,去法租界工部局参加考试;想拿中国驾照,去上海公安局参加考试。好在这三种驾照都能通用。

但是上海的驾照只能在上海用,到了北京就不一定好使了,因为北平市政府有规定:“持外地执照者若须在北平市内驾驶汽车,须到公安局呈验执照,经考试合格后,方得驾车入市。”也就是说,从上海开车到北京,必须先开车到郊区,然后搭车去北京市公安局参加一场临时的驾照考试,考试通过了才能把车开进去。这一点跟现在大不一样。

再说考试。北京的驾照考试包括两大部分,先是口试,再是“实地考察”。口试主要考汽车构造和驾驶规则,全是口头答题。答得好,让你通过;答得不好,下回再考。

实地考察又分两个环节。先是场考,考启动、挂挡、换挡、转向和熄火;然后路考,考转向、倒车、上坡和下坡。现在驾照考试里的“单边桥”、“S弯”、“左右库”、“定点停车”等等,在民国北京统统没有。